

1703



襄樊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北省襄樊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襄樊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北省襄樊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八年二月

目 录

襄阳的兵祸、土匪与保安团队	文思伟(1)
悍匪陈别三沉浮记	李国顺(10)
山大王孙秀章	程 逸(35)
民国时期的襄北“三荒”	刘培德(65)
刘发贵为匪始末	刘道山(72)
襄北的匪患	罗允文(76)
王立纯为匪记	李安才等(78)
胡金三人生事略	胡家祥 赵祖碧(81)
祝升平两次举义	李敬怀 杨蒿照(85)
樊城的会道门	刘树德(87)
万仙会的兴亡	汤茂荣(90)
熊宾与明德文社	李有让(98)
洪帮大爷马瑞堂	赵万爽(100)
襄樊的丐帮	阎让才 夏日初等(106)
解放前后襄樊地区的禁烟禁毒	李有让(113)
解放前樊城的妓院	彭毅生(127)
强笑声后的血泪	邹演成(130)
襄樊市社会福利院的变迁	李有让(135)
襄阳道慈善会	李有让(142)
襄阳旧殡仪概记	陈涛石 严永农(144)
马伯援	柳希荣(155)
为辛十月记	马伯援(162)
蒋介石出巡襄樊记	杨学端(172)
蒋介石巡视枣阳	赵万爽(174)

丁腾被捕记.....	赵云五(177)
枣阳卫姓考.....	卫光立(182)

襄阳的兵祸、土匪与保安团队

文思伟 搜集整理

襄阳地处鄂豫川陕交界处，为湖北的西北边陲地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每到改朝换代时，襄阳一带没有不打仗的。特别是解放前近百年间，兵祸连年，匪患不断，民不聊生，直到新中国成立，襄阳人民才结束了这段灾难史。

一、兵祸连年的襄阳争战地

晚清时期，襄阳地区曾发生了王聪儿领导的白莲教农民起义和红巾军起义，清政府几经争战，才将这两次农民起义镇压下去。1911年，武昌爆发了新军起义，襄阳地区的“江湖会”和革命党人积极响应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襄阳地区的统治，成立了襄阳军分府。后来，湖北军政府委任襄阳人刘公为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兼河南安抚使，率军进驻襄阳，进行北伐，同时也乘机杀掉了襄阳“江湖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人，夺了襄阳军分府的权。南北议和后，该军编入陆军第3师，仍驻襄阳。1913年4月，第3师师长王安澜率部进驻襄阳，直到1914年4月才撤走，随之鄂军派旅长犹龙率部驻防襄阳。在这期间，白朗起义军与第3师和奉军吴庆桐旅、豫军张锡之师在襄阳一带大战。1917年，驻防襄阳的中央陆军第9师兼襄郢镇守使黎天才和王安澜一起响应孙中山先生的护法号召，在襄阳开展荆襄自主活动，反对北洋政府。1918年元月，北洋政府派第3师师长吴佩孚率军进攻荆襄自主军，河南督军赵倜亦派南阳镇守使吴庆桐率军会攻。黎天才部旅长张联升、团长赵荣华率部叛离黎天才。荆襄自主活动在吴佩孚会攻下失败，吴佩孚部张学颜旅进驻襄阳，张联升亦率部进驻襄樊，张联升被任命为第5师师长兼襄郢镇守使。同年8月，张联升

迁驻老河口，第18混成旅旅长赵荣华率部进驻襄樊。1920年6月，赵部撤离襄樊，张联升率部重返襄樊。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张联升易帜，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9师，张后又投向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8路联军，张任总司令。在这期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军联军也积极“清共”，张联升充当了鄂西北地区反共的刽子手。其时湖北其它地区尚在武汉国民政府掌握之下，尚未公开反共，所以襄阳地区反共活动比全省其它地区为早，其它地区是在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开始的。当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率残部败走襄阳时，张联升一方面率部腰截吴佩孚残部，一方面又网开一面，纵放吴佩孚等少数人逃往四川，依附杨森。1927年7月31日，国民革命军联军方振武部进驻襄阳；8月，张联升率部调往河南驻马店，张联升从此离开了襄阳。9月，方振武脱离冯玉祥西北军系统，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直属第9方面军司令，其所属的第一军军长阮玄武驻襄阳，第二军军长徐寿春驻樊城，第三军军长马文德驻谷城、南阳。1927年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合流，蒋介石宣布“第二次北伐”。方振武率部撤离襄阳地区，开赴郑州一带。1928年4月25日，岳维峻率国民革命军联军第二方面军的3个军6个师进攻鄂西北，于5月初率部进驻襄樊。到8月12日，国民革命军第19军军长兼湖北省清乡公署会办陶钧（桂系军人）率所属的第18军、第19军各1个师和鄂北清乡司令李纪才部、42军马文德部来襄樊，以武力收编了岳维峻部。李纪才被委为陆军第5师师长兼襄樊警备司令。1929年5月30日，国民党陆军11师师长曹万顺，副师长陈诚率部抵襄阳地区，师部驻襄阳城区。8月12日，曹万顺调任新1师师长，陈诚接任11师师长。同年10月发生中原大战，蒋介石为了进攻冯玉祥的西北军，调蒋鼎文的第2军及所属的第9师（蒋鼎文兼师长）、赵观涛的第6师抵襄樊。陈诚此时已升任为第2军副军长兼11师师长。军部及9师、11师师部均驻襄阳城。6师师部驻樊城。到12月初，冯玉祥部为蒋介石所部击败，退往陕西，第2军亦相继撤出襄阳地区，李人杰

率 21 师进驻襄樊。1930 年 1 月,蒋介石调陆军 51 师进驻襄樊,师长范石生兼任襄樊警备司令,其时 51 师与罗启疆独立旅在襄樊地区负围剿红军的任务。51 师直到 1934 年才调走。到抗战时期,襄阳地区为国民党第五战区所在地,大军云集,战乱频仍。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首先是围剿中原军区的新四军五师,国民党军队集结在襄阳地区,围追堵截突围的五师部队。其后又成立以特务头子康泽为司令官的第 15 绥靖区,驻扎在襄樊。第 15 绥靖区被解放军歼灭、康泽被活捉后,第 13 绥靖区的王凌云又率部窜抵襄阳地区,直到 1949 年初,襄樊第二次解放后,襄樊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才彻底消灭。除了这些正规军队外,还有许多地方保安部队。辛亥革命后地方上成立的有团练队,到 1932 年后有地方保安团。1932 年到 1935 年,湖北省政府在襄阳设第 8 区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部公署。由刘骥、李家鼐、程泽润先后任专员兼保安司令。1936 年第 8 区改为第 5 区,先后任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有杨恩熙、林逸圣、马骥、王式典、吴良琛、李石樵。1942 年 2 月,徐会之任鄂北行署主任兼第 5 区保安司令。1945 年 4 月,程式任专员兼保安司令,1947 年 7 月,为保安司令,直到 1949 年春被解放军歼灭。自此,国民党地方上的反动武装力量才在襄阳地区肃清。

回顾从辛亥革命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几十年的历史,襄阳地区各色军队你来我往,调动频繁,一会儿被这个占领了,一会儿又让那个打跑了。从中可以看到襄阳地区争战不断,兵祸连年。新老军阀攻城掠地,搜刮百姓,残民以逞。老百姓有的流离失所,四处流浪;有的铤而走险,逼上梁山。土豪劣绅也拥枪自重,自立山头,称王称霸。在这兵荒马乱之际,战争中散失在地方上的枪枝又多,散兵游勇又盗卖枪支,这为土匪武装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军火来源。地方上的保安团队更是兵匪一家,甚至出现地方保安团点验时,人数不够拉土匪充数;军阀为扩充实力,也不断收编土匪,当土匪受招安成了“官军”,当土匪成了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当然,“官军”被打败后,也可以拉枪上山,重新为匪。

二、襄阳土匪的产生与发展

辛亥革命后，鄂西北大地烽烟四起，军阀混战，土匪也应运而生。这时的土匪势力尚小，一般只敢夜晚抢劫，白天还不敢大肆活动。1924年至1926年间，张联升盘踞襄阳时，收编了襄阳县东北乡的郭占彪、张成海等股匪，委郭占彪为副官，张成海为营长，活动在豫鄂边境的巨匪马云平也被张收编，委为连长。土匪收编当官，更促使匪势更加猖獗。1929年，陈诚的11师驻扎襄樊时，土匪气焰嚣张，襄阳县东北乡尤盛。东津湾、梁家嘴、张湾等地的团防局联合共同剿匪。一次，团防局在东津打火店与朱老五为首的十余股土匪相遇发生激战，团防局被击败，张湾团防局的头目吕良臣、肖大鹏、张西园与教练鼎洪升等被土匪击毙。当朱老五带着土匪流窜到武家坡时，陈诚部的两营人马正从梁家嘴北上，襄阳县长要求陈诚部的人马配合东北乡的团防局一起围剿朱老五。如果陈诚的部队当时认真配合团防局的人马进行围剿的话，朱老五这部份土匪是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据说，当时被围困的土匪派人携巨款与陈诚的人马暗地接洽，让陈部网开一面。结果，陈部得了钱财后，遇到土匪就朝天放枪，土匪就趁间一个也未损伤地溜走了。从此，土匪根本不把团防局放在眼里，连国民党正规军也不怕了。范石生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为蔡锷的老部下。范部是国民党地方杂牌部队，受蒋介石的排挤，粮饷枪械本身就不足，军纪十分糟，襄阳人称该部“白天是兵，晚上是匪”，使襄阳一带乱上加乱。同时驻扎在襄阳的还有滇军罗启疆的独立旅和由土匪张恒金、陈别三股匪收编而成的“鄂北游击队”。国民党调来这些武装的主要目的是围剿共产党领导的襄（阳）、枣（阳）、宜（城）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贺龙领导的红军。张恒金是河南省邓县的大土匪头子，陈别三是光化县赵岗一带的大土匪头子，后来，他们被国民党收编为“鄂北游击队”，以张恒金为司令。这支由土匪收编的武装驻扎在双沟一带时，又在襄阳收编了朱老五、梁大鼻子等土匪武装以扩充自己的实力。

国民党县政府也乘机收编了一些土匪作为县政府的武装力量，如1932年，李朗星成立襄阳县保安第四大队时，就收编了马福乾、传开昶等股匪，委马福乾为副官、传开昶为分队长。这些收编的土匪不仅发了财，还捞到了一官半职，打劫可以化暗为明，以合法名义，干土匪勾当，不断地向当地的老百姓“游击”。后来就发生了张恒金率部攻打陶王岗的事。陶王岗是一个大姓聚居地，当时陶王岗为了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保护本庄的安全，村庄建有寨墙，拥有一支火力不弱的武装，一般散兵游勇、土匪也不敢轻易动陶王岗。陶王岗的陶德瑶、陶德琨兄弟俩是当时社会上很有声望的人士。陶德瑶是清末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老同盟会成员，回国后又入保定军校一期学习，后入广西，与同学蔡锷在广西训练新兵，创办桂林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时在广西参与独立活动，并带兵援鄂，后曾任湘军旅长、长沙道尹等军政要职，与国民党许多上层人士有交往，其时赋闲在家。其弟陶德琨为清末留美经济学硕士生，回国后参加武昌辛亥革命起义，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长，此后始终在财政部工作，其时在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任币制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张恒金攻打陶王岗，陶王岗岂肯示弱，一方面组织人马顽强抵抗，一方面派人要求范石生部派兵围剿张恒金的“鄂北游击队”。由于范石生是蔡锷的老部下，陶德瑶又是蔡锷的同学，所以陶王岗一请范石生出兵，范石生就立即出兵，结果张恒金大败，带着的自己的心腹干将逃回邓县老巢，其副司令胡仁彦被炸死，其三旅旅长陈训俭（陈别三的二哥）也带着自己的败残人马逃回纪洪岗老巢。这次大战就这样结束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所谓游击司令如曹勛、崔陟峰、张鹏云等地方武装也大量收编土匪武装，如余华凤、张焕朝、赵小指等股匪都被他们收编。国民党正规军也收编土匪武装，如襄东一带的土匪刘发贵等人就为33集团军180师师长刘振山所收编，后借故将其全部杀掉。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不仅大量收编了土匪武装，有时连收编手续都不要，就发出一纸任命书，土匪队伍就改头换面变成了反共武装，如陈别三这个大土匪头子就

被国民党任命为“光谷联防指挥部”指挥官，后来又加封为“均（县）光（化）谷（城）内（乡）淅（川）邓（县）镇（平）七县联防副指挥官”，可谓声势喧赫，不可一世了。这时官匪已完全一家了。

三、襄阳土匪概况

襄阳县土匪如果从1921年张联升盘踞襄樊时算起，到1948年襄樊第一次解放时止，有名有姓的计有91股。土匪活动的地区主要是东北乡、北乡、东乡，以东北乡最为厉害，南乡较少，西乡没有成股的土匪活动。东北乡的匪首先后有：武庭藩、李五炳子、郭矮子、张有达、杨三盛、郭占彪、唐小明、李狗顺、张成海、张老五、龚学安、郝有成、刘小聚、朱老五、朱至国、朱至善、朱至高、朱善政、朱善祥、吴凤山、韩耀亭、马福乾、梁大鼻、梁信子、程国先、陈三、郑明道、郑锁子、刘毛鸡子、张鸭子、张义舟、孟占奎、陈胡子、齐大明、弼马老太爷、马德弼、马洪连、张大朴实、马天亮、马满昌、朱光杰、梁兰亭、钟占魁、马双义、毕万才、刘正富、甘金玉、赵六指、王玉山等人。北乡匪首先后有：杨老么、杨文僚、杨界平、王老八、索金亭、徐老四、薛老母猪、余华凤、张焕朝、车金山、樊石三、周光甫、周磨户、李雪林、宋大元、刘光礼、杨垮三等人。东乡匪首先后有以吴兴起的九弟兄、岳结巴、张老四、吴玉清、雷正常、刘发举与刘发贵兄弟俩、韩老七八、传开昶等人。南乡匪首先后有胡玉成、毕文还、曹富荣、赵洪升等。这些土匪大股的有枪数百支，如张有达、毕文远、索金亭、吴兴起、熊心合、朱老五、张焕朝、杨垮三、刘发贵等都拥有几百支枪；有的只有百多支枪，如张成海、宋大元、刘光礼、李雪林、梁大鼻子、刘发举等。小股土匪一般只有几十支枪或上十支枪。各股土匪人数一般不固定，聚散无常，多系临时纠合，其骨干比较稳定。除了这些成股的土匪外，还有些散兵游勇就很难统计了。

四、匪祸带来的灾难

刚开始时，土匪打劫对象主要是地主老财，后来土匪越来越多，有的地主老财躲进襄樊城里去了，有的在家乡购枪筑寨自保，有的与土匪互相勾结利用，以匪自保，甚至成为暗匪。这时土匪活动就十分猖獗，就不分贫富地乱抢劫了。在他们的活动地域内，喊款、拉票、劫路、拦船，奸掳烧杀，无所不为。由于土豪劣绅与土匪相勾结，土匪也充当土豪劣绅的打手，参与仇杀和残害人民的活动就更多了，这时就不仅仅是以劫夺财物为目的了。如1927年至1930年间，恶霸王静轩、鄢丹青为争夺襄阳北乡太山庙、薛集、吕堰驿一带为统治权，双方各拉一部份土匪为打手来争霸，王静轩拉拢匪首杨文杰，鄢丹青拉拢匪首王老八，双方以驿路为界，驿路东为鄢丹青、王老八的地盘；驿路西为王静轩、杨文杰的地盘。双方你打过去，他打过来，奸掳烧杀，相斗几年。此后，这一地域匪患不断，闹得纵横数十里杳无人烟，村毁地荒，商旅不前。薛集、吕堰驿一带野草蓬蒿没人，野兔成群。兔子见人不仅不跑，碰上病人，还把人咬死，成为一件怪事。这一带到解放后都开垦成国营农场。国民党襄阳政府在土匪眼里也不值几文钱。1929年，国民党襄阳县县长蔡文政率地方保安团队到南乡剿匪，被土匪毕文还、曹富荣率人马将蔡文政一行人全部俘获，随行的土豪王柏森也未能逃脱。1930年9月，河南有四、五十只满载芝麻油、棉花、烟叶的货船结帮从白河驶向襄樊。由于船帮的帮头事先只与河东的匪首程国先接洽，缴纳过境保护费，而未能与河西匪首朱老五接洽。朱老五不满意，就准备截船。朱老五从刘家集（朱的老巢）到梁家嘴沿河五、六里都布置有土匪等候船只。当船行到刘家集时，土匪上船一面抢劫，一面放火烧船。船上的船民、客商不是被杀死，就是被烧死，侥幸逃脱的多是跳水泅渡才幸免于难。由此可见当时土匪的凶残猖獗。

五、保安团队

保安团队是地方武装，它的产生与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32年，这个时候它的武装力量不强，散居在各个区镇，一般由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掌握，县里并不直接管理。1932年后，它就成为县政府直接掌管的地方武装，成为反动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群众的得力工具。

辛亥革命后，各地实行地方自治，襄阳县划为八个区，每个区设有自治局。有自治局局长一人，由局长负责组织团练活动，团练主要是维护地方治安。参加团练活动的人所持的武器一般是刀矛土枪。1921年后，地方上土匪逐渐增多，社会治安状况也越来越差。这时，襄阳行政区划也由八个区划为二十个区，自治局也改名为团防局。团防局的首长也改称为团总或团董，团练队也改名为常练队，设教练一人，负责常练队的训练。1930年秋，各区的团防局改名为保卫团，团总改称为团长。全县设立保卫总团，由县长兼任总团长，副总团长由地方上一名有统治地位的人士充当，常练队也改名为常备队。当时全县设有一个总队、四个大队，总队长由县长兼任，副总队长由副总团长兼任。第一大队大队长黄襄，大队部驻朱家集；第二大队大队长柳光景，驻黑龙集；第三大队大队长刘俊，驻黄山洼；第四大队大队长颜得胜（云南人），驻双沟镇。以后常备队又改名为保安队。

1932年9月，刘骥任湖北省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和襄阳县长。当时襄阳县设保安总队及团务整理委员会，刘骥兼任县长、保安总队长、团务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次午为副总队长，杨君谟、周朋忱、胡东明为委员。团务委员会设团委、文书、财政、调查四股，赵挥三为团务股主任，孙子佳为文书股主任，康南星为政务股主任，张子平为调查股主任。这时，全县编有四个保安大队，每个大队编有四个中队，李朗星这时已是第四大队大队长，驻在东津湾。其他三个大队头目也换了人。1934年9月，李

家肅任第八區行政督察區專員兼保安司令，李將各縣的保安隊統歸專區管理，把全區的保安隊編成五個保安大隊，襄陽縣的四個保安大隊合編為第一大隊，大隊長為李朗星，駐襄陽城內龍聖祠，其他四個大隊駐在各縣。1936年3月，程澤潤任第八區行政督察區專員兼保安司令，程將五個保安大隊改編成湖北省保安第十四團，由保安副司令李如蒼兼任團長，湛磊副之，原保安第一大隊改編為一營，營長由李朗星充任。當時李朗星在國民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高等教育班受訓，其營長一職由營附馬行健代理。1937年元月，李朗星學習期滿返回襄樊，升任為湖北省保安十四團團長，團部仍駐扎在襄陽城內。同年8月，十四團改名為湖北省保安第四團，全團調往鄖陽，1940年復調回襄陽。1943年該團調往隨縣，其時李朗星已升任為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但仍兼保四團團長。後來，保四團改編為湖北保安第五大隊，以四團中校團附柳明都為大隊長，柳後來在卸職時因武器交接不清而自殺，而李朗星在1943年被任命為第五戰區第九縱隊司令。到1945年，李朗星率第九縱隊回襄陽，而保安第五大隊仍留在隨縣。1947年，李朗星被任命為保安司令，這時，國民黨的統治已是搖搖欲墜。到1948年襄樊第一次解放時，李朗星化妝潛逃。解放軍撤出襄樊作戰略轉移後，李朗星又回來收拾殘兵敗將，重新成立其土匪武裝，因這種武裝都穿着和老百姓一樣的大布衫，所以群眾稱其為“大布衫隊”。到1949年襄樊第二次解放時，李朗星只有不斷潰逃，最後從四川逃往香港。遺留在襄陽地區的土匪武裝到1951年全部肅清，人民從此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過去鬧土匪而荒蕪的土地，如今已是沃野萬頃，林茂糧豐的錦繡莊園。

悍匪陈别三沉浮记

李国顺

在豫西南、鄂西北和陕南毗邻地区，凡五十岁以上的人，要提起“陈别三”三个字，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陈别三因出生在老河口北部山区的边缘地带，所以也有人称他为“陈霸山”。陈别三在鄂、豫、陕边沿地区闯荡几十年，可称得上地道的巨匪。

陈别三，原名陈训兆，字汉三，因性情倔犟，绰号别三。1902年出生于现老河口市纪洪岗一个相当于富裕中农的家庭，粗通文墨。幼年时老实憨厚、少言寡语。因他处在清末、民初那个动乱时代，加之地理环境以及家族对他的影响，天时、地理、人缘等关系，促使他走上了土匪的道路。

陈别三从开始的小打小闹地打家劫舍，发展到聚众千余人枪的巨匪，是经过三十多年的争斗、联合、吞并的血腥生涯，直到解放战争中，接受国民党的任命，直接与共产党为敌，最后被人民政府所剿灭，才走完他复杂的人生道路。

我为此花费两年多的业余时间，先后六下纪洪岗调查，访问过近30位知情老人，查阅过有关资料，整理出这篇史料。

一、乱世风烟起，陈别三风云际会走黑道

陈训兆，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三，由于他性情孤僻倔犟，所以人称他“别三”。

陈别三出生在光化县（现老河口市）北部的一个边沿小镇——纪洪岗。纪洪岗地势较高，它东接河南邓县，西过赵岗就是汉水，南穿袁冲就达到老河口郊区，北越过横山就是河南省的内乡和淅川县管辖地带。这里离县城较远，紧挨横山。横山山峦起伏，又是河南、湖

北两省的界山。山势较高，地形复杂，山上有石寨，山下有石洞，正象当地群众所说的：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这个两省四县交界、地形复杂的山区就成了盗匪出没之地：如邓县的丁大牙（丁叔衡）、内乡的卢大牙、淅川的曹团总（曹文杰）都在这一地区活动过。所以纪洪岗这个地方为陈别三土匪的产生、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陈别三在此为匪可以东抢西躲，南劫北藏，进退都有余地。陈姓是光化的大姓，正如光化群众在形容旧社会光化四大姓流传的一句口头禅所说的：“陈半山、韩半县、徐一圈、魏姓占了半边天”。陈别三就是利用家族的势力发展起来的。

陈别三的父亲是兄弟俩，大伯叫陈家高，父亲叫陈瑞高。祖上原有100多亩山岗薄地，10间土坯房，3头牛。老弟兄俩分家时，家高人口多些，分得土地近70亩，7间房子两头牛；瑞高分了30多亩地，3间房子1头牛。

陈别三兄妹三人，他是老大。分家后他虽然只有10岁，为了生活，不得不辍学在家做些放牛、割草、拾柴、捡粪等农活，以减轻家中的负担。老弟兄们虽然分了家，由于兄弟之间平时感情很好，分家以后，还是不分你我，相互照顾。陈家高除了农活外，还会个糊纸扎（死人祭品）的手艺，他的二儿子陈训俭比别三大个上十岁，也跟随父亲学会了这个手艺。爷儿俩除了农忙之外，还在纪洪岗开了个纸扎铺，农闲时做些纸扎，赚几个钱贴补家中生活，一家人日子过得比较好些。陈别三常在伯伯家吃喝，时间一长，对伯伯和二哥的感情也自然融洽起来，大伯和二哥吩咐的事他大都照着去做。

在那个“一人吃饱千人恨”，缺吃少穿，生活困苦的社会，陈训俭的家庭生活在纪洪一带是比较拔尖的，这样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忌妒。

纪洪岗是个岗多平地少的鱼背地形，正象人们所形容的“干旱人人愁，下雨遍地流，吃水如吃油，犁地累死牛”的穷地方。夏粮多是小麦、蚕豆，秋季多是苞谷、红薯，辛苦一年，亩产平均也只不过三、四百斤，除了完粮纳税之外，还有土匪、盗贼的明抢暗偷，群众的生活便可想而知了。人们吃顿馍如同吃点心。到了秋后，群众的生活几乎是

一个模样，就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早晨唧唧唧（用力剥红薯的声音），晌午靠山装（靠到锅沿蒸红薯），晚上改个样，还是红薯汤”。红薯已成为这一地区群众维持生命的主要粮食。正因为陈训俭家中的生活比一般群众生活要好，就引起了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这样渐渐传到河南管辖的张店“局子”头头（地方政府设立的税卡）的耳朵里。纪洪岗距张店只不过十几里地，张店局子几个头头陈四杆子、陈尧鼎、张高升等人听到陈家高家有油水可捞，就凭着他们手中有几支枪杆子，到了纪洪岗陈家高家，以纳税为名，要陈家出一支枪钱，并限期交齐，扬言不交齐就要如何如何处罚。陈家高父子俩听到这如同晴天霹雳，把头也炸懵了，着起急来，不知如何是好！买枪吧，一支枪那么贵咋买得起？不买吧又交不了差？为此，爷儿俩几天吃不下饭。正在闷闷不乐的时候，陈训俭的姑老倭梁立魁路过他家。梁立魁家离陈家不远，有三、四支枪，凭着几支破枪，不干农活，指靠打家劫舍混日子。家高看到梁立魁到家，就把这个心事给梁说了一遍。梁接过头说：“交给他个屁，有钱我们不会自己买枪拉起杆来，看他敢不敢惹我们？”陈家高在梁立魁的授意下，心领神会，一狠心就买了两支枪，和梁立魁合伙拉起杆子。

陈训俭是个有心人，他怕张店局子对他们进行报复，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准备端掉张店局子。他首先暗中买通在局子当护兵的陈训方。陈训方是六官营的人，和训俭是一个家门。六官营距纪洪不到三里地，互相都很熟悉。陈训方兄弟三个，他是老二。六官营村前有条河沟，土地比较肥沃，陈训方又是六官营的大户，家中拥有百多亩地，几十支枪。兄弟三人没分家，老大带领伙计种地，老三（人称小三佬）领着一班人马在外闯荡，训方就在局子干个差事，挎着腰炮，手枪，除了粮饷外，还到处敲诈勒索。

陈训方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人，得到了陈训俭的好处后，就积极为陈训俭卖命。陈训俭和陈训方二人暗中商定计谋，就在民国四年（1915）夏初，利用“四月八日”赶庙会的机会，把人打入会场。到了半夜，戏散台了，赌场散伙了，人们都各自回家睡觉了，由陈训俭伙同陈

训方等人带领人马，以陈训方的名义，先到陈四杆子家中喊门，说什么：“四哥呀（四杆子派号老四），快起来，我们局子被踏了（意思是被抢劫）！”待四杆子慌忙开门时，训方用手枪对着门缝将他打死了。随即用同样手段，先后把陈尧鼎、张高升都解决后，转身到了局子，把十几支步枪弄到手，连夜赶回纪洪岗。

张店局子被端掉后，陈训俭既除了心腹大患，又壮大了个人势力，内心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劲儿。这个事件的发生，对上十岁的陈别三来说，在脑子打了个深深的印记。

民国六年（1917年），陈别三15岁时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邓县管辖的张岗村一位姓张的姑娘结了婚。在那个年代，姑娘出嫁，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娘婆二家两姓一加，夫姓在前，本姓在后再续一个氏字，就成了自己的名字了，所以陈别三的老婆自然也就叫陈张氏了。陈张氏长得漂亮，聪明能干，做起针线活来也是一把好手。在那个半封建的旧社会，男女双方婚前又没见过面，婚后陈张氏看到别三那个长像，内心渐渐就生起一股噁心劲。陈别三脸黑、个大、脖子又长，喉结又比一般人突出，说起话来吐词不清；不管在家还是走亲访友，吃饭时不爱坐，老喜欢朝板凳上一蹲，活象一个猴子。因此，陈张氏当看外人面就叫他“老猴精”。

陈张氏婚后一、二年的时间也没有生育。一天她在本村一家磨面时，和一个家门弟弟勾搭成奸。事也不凑巧，此事被陈别三担水时路过发现了。当时陈别三憋了一肚子闷气也没有说什么。因此，他朝思暮想要出这口气。一天，他找着二哥陈训俭说：“二哥呀，我也想干（指拉杆）！”陈训俭说：“看你那个样子，人没人，货没货干个啥？”没有同意他拉杆子。过了几天，别三为了雪心头之恨，就把真情向二哥讲了，陈训俭也就同意他人了伙。

陈别三入伙以后，在二哥陈训俭的扶持下翅膀逐渐变硬了，就在民国八年（1919）的一天，外号叫李老歪的家门老倌，（他们彼此都很熟悉各自的为人）到纪洪闲逛，被陈别三看见了。他就一把将李拉到一个僻静地方，两人点燃旱烟袋，就拉起话来。陈别三对李老歪说：